

石油的依赖,让美国从中东的政治纷争中解脱出来。在历次关于清洁能源的讲话中,美国领导人都指出,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才能让美国远离中东事务,增加其战略活动空间。另一方面,美国又要担当全球领导者,不希望在全球重要地区、重大事件中缺席。特别是,中东、北非地区在地理上接近欧洲,这一地区动荡直接影响到欧洲的稳定和繁荣。出于对欧洲盟国的责任,美国也不能撒手不管。在是否要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问题上,美国的态度就是这种悖论的反映。从本国利益角度讲,美国非常不愿意对利比亚动武,不想再次卷入中东地区的战争,不想使美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但是,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作为欧洲的盟国,美国又不能无所作为。正是在这种两难选择背景下,英法等欧洲国家积极鼓动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而美国则态度模糊,一再强调设立禁飞区的前提条件和困难。

在中东、北非反恐问题上,美国面临越反越恐的矛盾和困境。中东、北非地区的恐怖组织因为痛恨美国干涉中东事务,所以才将美国作为首要攻击目

标。但是,美国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必须加强同埃及、沙特、也门等政府的合作,深度介入中东事务。这样,美国在中东反恐问题上似乎陷入一个逻辑困境。因为美国对中东事务的长期干预,中东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才攻击美国。因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攻击美,所以美国才不得不深度介入中东事务。“9·11”后,美国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再度深度介入中东事务,结果引发更大的反美浪潮。

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全球性大国,既要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又要推行美国价值观,这让美国的对外政策充满矛盾、悖论。而中东又是一个独特的地区,经济上掌握全球石油供应命脉,地理上处于欧亚非三大洲枢纽,政治上激进的宗教力量和温和的世俗势力并存,社会上现代和传统互相竞争。于是,就产生了现在扑朔迷离的美国中东政策。目前,美国应对中东、北非变局的政策是矛盾的。未来,中东的政治变革还将进一步向前发展,美国的政策仍然是矛盾的、冲突的、多重标准的。○

中东变局、美国应对、中国启示

袁 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研究员)

埃及缘何变天?美国起何作用?中国有何启示?由于事态仍在演进中,因此难免见仁见智,无法给出令人完全信服的结论。

但就埃及变天的教训而言,至少有三点值得总结:其一,经济上疏离全球化、政治上背离民主化、外交上走向边缘化、社会上拥抱网络化是此次革命最深层原因。百万人突上街头,与其说是对穆氏不满,不如说是对国家发展方向的绝望。在全球化、民主化浪潮中,曾处同一起跑线上的亚非拉大国,均应对变局、实现崛起,唯埃及反应迟钝,经济上不思变革,政治上落后腐败,外交上无所作为,与世界大潮格格不入。作为曾经的阿拉伯世界领袖,埃在阿以冲突、伊拉克战争、伊核危机等重大问题上“政治失声”,影响力甚至不如半岛电视台,成为可离可弃的“鸡

肋”。相反,在网络化方面则“大门常打开”,“脸谱”、“推特”畅行无阻,各种西方思潮肆意渗透弥漫。这种拒斥全球化、拥抱网络化的错位政策催生经济“僵化”与社会“异化”,令表面平静的埃及终于在沉默中爆发。

其二,政府对“公民社会+微博时代”催生的社会剧变敏锐度不高、重视度不够、应对无方,终致未能挺过最后一关。“公民社会”现象是当今世界大潮。体现在埃及,则是“后伊斯兰主义一代”的崛起与军队的异化。此次埃及革命被一些西方媒体称为“青年人革命”或“军队起义”,引人深思。长期以来,无论西方世界还是阿拉伯世界,在看待中东青年一代时,更多关注其反美、反西方的宗教极端化一面,却忽视其反独裁、要民主的一面。事实上,近 30

年来,在头巾、清真寺、宗教电视频道背后,已然涌动着深刻的社会变化:年轻一代由于受到更好的教育、掌握更多的资讯、拥有现代通信手段,对宗教与政治的认识已远不同于父辈。面对政治腐败、高失业、社会地位下降,他们缺乏民族尊严,对国家前途一派迷惘,不再把伊斯兰视为一种能够建立更好秩序的政治意识形态。他们虽为伊斯兰主义者,却在政治上热衷“民主游戏”。正因此,他们虽无共同政治目标,却在对国家、政府、人生的认识上同气相求,往往一呼百应,形成集体效应。与此同时,长期受美军援、培训的埃及军队,也异化为一支“和平队”,在政府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选择与街头民众站在一起。事已至此,穆巴拉克退场也就理所当然了。

其三,过分相信同美国政府结成的特殊盟友关系,将自己的命运系于外来势力。诚然,埃及作为美国中东战略支柱,长期受美国扶植和支持。但此一时彼一时。穆巴拉克未能敏锐把握美国对埃政策的微妙变化:一方面,长期执政的穆巴拉克“廉颇老矣”,对中东政治影响式微,对美战略意义下降。相反,埃及社会爆发出的民主力量无意中调动了美国战略的民主化神经,美弃“废子”、布“新局”可谓顺理成章。另一方面,美对埃特殊关系又有两面性,既有笼络扶持穆巴拉克政府为美所用的一面,也有暗中扶植军队亲美力量、支持社会变革力量、推动青年革命力量的一面。当穆巴拉克对美“有剩余价值”时,美会强扶不使其倒;而一旦“剩余价值”用完,美则听任已然壮大的民间力量发挥作用。奥巴马政府在埃及变局中经过冷静观察和审慎评估,最后决定“弃穆”,充分显示了美国外交政策中冷酷的现实主义色彩。

一般认为,美国并非此轮中东变局的始作俑者。从其最初始料未及的反应看,美倒更像是个“受害者”。但从接下来的种种言行看,美国的战略应对却有条不紊,有的放矢,这又多少让人觉得美国的战略意图“并不简单”,至少显示出特有的危机反应和战略调整能力。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节奏是否打乱,步伐是否放缓?抑或是否会出现根本性的战略回调?这是目前人们最关注的问题。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原因有

二:其一,战略重心东移是奥巴马政府对当前及未来国际局势、亚太局势、国家利益综合评估后做出的战略判断,是基于世界权势东移、美国经济复苏、应对大国崛起、重塑盟国体系等综合因素做出的战略抉择,事关美国全局和霸权未来,在美朝野有共识,不会轻易因中东变局而改弦更张;其二,从实际情况看,美国在亚太的种种布局并未因中东变局而有丝毫改变,克林顿国务卿仍不遗余力地推动亚太经贸自由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也正加速推进或落实,美与日、韩、菲等盟国的系列军演按部就班地接连展开,如何在东亚峰会扮演新的政治角色和进行政策选择也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因此,很难说中东变局将逆转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大势。

既如此,难道美国甘心看到中东格局之变冲击美国战略利益?也不是。如果说在埃及变天的最初几天美国确实有些无所适从,在要“民主”还是要“稳定”之间犹疑不定,那么随着事态发展明朗化,美国的战略应对也逐渐明晰。概而言之,一是坚守战略底线不动摇,千方百计确保以色列安全、确保石油自由流动、确保继续主导中东格局;二是灵活运用各种资源,利用外交舞台笼络大国合作,调动民间力量(及反对派)进行内部制衡,慎用军事力量防止易进难出;三是区分轻重缓急、分层管理,拟定弃穆(巴拉克)、护巴(林)、攻卡(扎菲)、压伊(朗)、稳沙(特)政策方针,环环相扣。其中最为根本的一点,是美国战略界在经过全面评估后,认定了中东政治的一个新现实:与其继续维持与一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无所作为、被全球化抛弃的专制政权的关系,不如选择与公民社会催生出的新的民主力量加大接触,寻求新的战略稳定。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主意已定,但中东变局确实也令其分心,如何既抓重点,又兼顾两头?国务卿克林顿亮出了一招“新牌”,那就是大做“网络自由”文章、重炒“自由民主”话题。从精心准备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到认真谋划的与埃及青年网络对话,克林顿放大中东变局的民主化效应,渲染“推特”、“脸谱”等新网络的特殊能量,将地缘战略变局引向政治社会变革,矛头直指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民主化战略力图改造的对象。于是乎,中国在东亚的战

略安全压力虽有所减缓,但国内维稳和政治挑战却无形增大。这恐怕正是美国所期望看到的局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会轻易在利比亚重启战端。不仅因为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条件不具备,利比亚还找不出像样的代理人,而且因为利比亚无论在石油还是在安全上均不对美国构成实质性挑战,并非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所谓“人道主义”灾难,既然容忍其在苏丹达尔富尔大规模上演,对利比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何妨?何况美国已成功将大国拉进制裁卡扎菲的行列,将美国的敌人变成全球公敌,政治收益可谓不薄。草率动武,岂不白白断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

如何评估中东变局的利弊?从中东视角看,此轮变局攸关全球油价,影响地区稳定,各国莫不深受其害。但对中东石油依赖度更高、对该地区投资更大的中国而言,短期内挑战似乎大于机遇;从阿拉伯视角看,此轮变局可视为阿拉伯世界又一轮政治觉

醒,反独裁反专制的民主化诉求与反西方反美国的伊斯兰化色彩相互交融,无疑给国际政治多极化注入活力,这一点对中国倒不失为机遇;从非洲视角看,苏丹、突尼斯、埃及松动整个北非地缘板块,并对黑非洲造成冲击效应,其对中国在非洲长期形成的政治资源和近年急剧扩大的海外利益不啻构成新挑战。由是观之,中东变局对中国既有机遇,更有挑战。

更重要的是,能够实实在在抓住并转化为战略利益的机遇才是真机遇,否则就是假机遇。中国是否具备能力和战略准备去抓机遇?这是问题的关键。美国的战略应对给人的启示在于,或许中东变局对其全球战略布局和中东主导地位构成重大冲击,但如果善加利用,巧妙应对,化危为机,则未必不会重塑中东格局。而这似乎正是奥巴马、克林顿、盖茨们所思、所想、所为的。○

中东动荡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朱 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从 2011年 1月 14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下台到 2月 11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放弃权力,政局动荡正在冲击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利比亚的卡扎菲恐怕难以逃脱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命运。目前看,中东动荡的冲击波进入尾声,但中东政治已出现颠覆性变化。可以肯定的是,未来 10-15年,中东将会一直挣扎于如何重建被打碎的政治权威、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中东动荡究竟将对世界局势造成什么样的冲击,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话题,以下几方面影响已初见端倪。

首先,不管中东动荡在阿拉伯国家中有如何不同的表现和进展,但其本质是中东草根阶层为主导的革命性群众运动,其根源是中东地区普遍的公民意识与人民主人意识的觉醒,其政治诉求是现政权的妥协对抗,其目的是通过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意识形态和法律体制来实现政权与秩序重构。从

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是阿拉伯世界开始融入世界民主的重要开端。

从 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爆发了三场历史性革命。第一场是 1952年埃及前领导人纳赛尔所领导的“纳赛尔革命”,其目的是实现中东地区从前西方殖民者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结束联合国的托管制度,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1979年伊朗爆发了“霍梅尼革命”,其目的是通过恢复伊斯兰宗教的政治影响力,反抗当时西方势力对中东的大规模渗透和对石油等伊朗国家资源的控制。2011年的中东动荡是一场中东民众自发的“民主革命”,其目的是推翻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长达数十年的“强人政治”,反抗家族统治和少数统治精英对国家财富的垄断。在二战后世界所出现的“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阿拉伯国家始终置身事外。阿拉伯国家与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进程绝缘似乎是铁律,但 2